

优化投资软环境 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合判断,在经济增长没有发生明显波动的情况下,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增长16%左右。

(一)利用外资增长的有利因素

1、外部投资者的信心增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全球FDI呈逐步复苏态势,2016年全球FDI流入量预计将增长到1.5万亿美元,近三年中,有意增加FDI支出的跨国公司比例预计将从24%增加至32%。在FDI流量增加的同时,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依然是外部投资者最为青睐的投资地区,而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外部投资者依然对我国保持较强的投资信心,这对我国利用外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

(五)我国对外投资产业多元化

以往采矿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热点,然而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我国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滑,2014年的投资额同比下降33.3%,而对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大幅增加,分别增长33.2%、24.9%、126.3%、67.0%和36.1%。

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目的地分布广泛,遍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1.1%。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2014年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7.87亿美元和75.96亿美元,分别增长116.3%和96.1%。同时,我国对欧美国家投资及行业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对外投资正由传统的自然资源领域向高新科技与服务业扩张。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将保持增长

在利用外资方面,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而国际间的资本竞争也日趋激烈,从而使我国吸引外资的困难加大。但应注意到我国正由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并承接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同时,我国不断改善外商来华投资环境,因而保持着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综合判断,在经济增长没有发生明显波动的情况下,2016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将保持稳步增长,预计增长6%左右。

(二)利用外资增长的不利因素

1、国内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过去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等吸引了大量的来华投资,而如今受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影响,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加之我国对劳动者的保护的加强,导致劳动力成

本逐年攀升。另外,我国的土地成本、资源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也相继上升,过去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取消,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在华的生产经营成本逐渐升高,利润空间减少,特别是对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冲击较大。

2、国际资本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得到进一步增强,各国对外资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完善的资本市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产业综合优势加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如美国制定的“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吸引制造业资本回国,重塑其制造业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借助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采取全面的市场开放和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的进入。而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丧失竞争优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排斥中国的贸易投资协定达成等因素,都会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较大冲击。

3、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对吸引外资进入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涉及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的投资。我国目前正经历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制造业的转变,因此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有利于改变外资的投资方向及先进技术的转移,从而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起步相对较晚,产权意识薄弱,一些地方知识产权执法不严、惩罚力度不够,而且侵权的方式越来越隐蔽,阻碍了部分外资向我国的投资。

(三)对外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

1、全球各国对外资的需求依然强劲

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外资。对发达国家而言,外部资金的投入有助于其改善疲软的经济形势,减轻其面临的高失业率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资金的投入有助于推动本国工业化的发展,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我国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为了对国内企业提供便利化的对外投资环境,我国正在不断深化境外投资管理改革,同时我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加大对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并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多双边投资协议。国外强劲的需求以及国内政策大力支持为我国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机遇。

(四)对外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

1、部分地区地缘风险和经济风险上升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资

源出口国家外汇储备出现恶化;美国加息预期的增强导致全球资本加速流出,部分国家的货币出现大幅贬值,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使债务较高的国家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会导致我国投资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收益下降并减少对该地区的进一步投资。

2、我国企业对当地法律、习俗、文化等尚需深度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由于对投资地区相关法律的不了解以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走出去的企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投资纠纷案件及水土不服的情况,对未来的对外投资的增长形成挑战。

三、优化投资软环境 提升企业竞争力

(一)继续优化投资软环境

在保持良好投资硬环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一是要完善法律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知识产权;二是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三是要改善行政管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凭借公平有序、稳定、法制健全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外投资者。

(二)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继续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以及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并逐步创造自己的高地经济,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完善外商投资政策,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在引导外资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应注重引导外资优化我国区域结构,帮助中西部地区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从而形成国内的“雁阵模式”。

(三)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应以政府为主导,系统整合海外不同地区的资源,全面建设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综合管理于一体的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及地区的信息收集、评估和发布,建立健全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及防控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支持。

(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要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争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二是要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并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形象,实现企业品牌与中国品牌的互动;三是要通过海外并购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核心技术及管理经验;四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强化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执笔:邬琼)

从供给需求两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民生银行研究院

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4年中国铁路网密度为0.71公里/百平方公里,是欧盟密度的七分之一,但中国高速铁路里程已占世界总量的55%。2014年航空客运量为3.91亿人次,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年飞行次数仅为0.29次,不足世界平均的70%。通信方面,2014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9.3%,百人手机账户数量为92.3个,基本处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5、

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部分仍处在下降趋势

6、

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为2072立方米,仅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量50年来减少了近一半;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78公顷,不到世界的近一半,1960年以来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一半;森林覆盖率为21.9%,低于30.8%的世界平均水平。

7、

人均自然资源量匮乏,不少资源近年来仍在减少,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

8、

人口数量下降,质量提高,基础医疗与发达国家差距仍较大

9、

201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已基本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死亡率处于世界低水平。2013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5.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9.1岁。2014年中国每万人拥有执业医师21.2人,拥有病床48.5张,基础医疗较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

10、

2014年中国每万人教师数为89.5人,高于世界平均的86.7人,低于高收入国家的106.4人。中国2014年识字率为95.4%,几十年来大幅提高,基础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

11、

高等教育水平进步明显,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

12、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为18%,1982年仅为1%,但较G20国家平均28%、OECD国家平均33%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7%,低于32.1%的世界平均水平,较欧美国家50%以上的毛入学率差距更大。2013年中国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年,低于发达国家2到4年左右。

13、

2014年中国科研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01%,人均科研经费支出仅为141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2014年中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但每万人全时当量仅为25.9人,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2014年源于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总量达17.6万件,列世界第三,但人均仅为1.29件,是日本的1/20。2014年高新技术出口额为5601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但人均仅为413美元,仅为韩国的六分之一,差距明显。

14、

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1%,欧洲高福利国家通常高于40%,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5%左右,中国处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中国2014年人均税收收入为1422美元,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为18.8%,低于欧洲高福利国家,但高于美国、日本、韩国。

9、金融业发展较快,但保险业发展落后

2014年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7.3%,较2013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高于美国0.3个百分点,低于英国0.9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日本、德国等实体经济发达国家,整体来看金融业发展较快。2014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的比重为123%,与美、英、日等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2014年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的比重为115%,低于美国,但高于德、法、日、英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2014年保险业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3.1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10、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显著落后

近年来中国空气质量不断下降,2014年全国主要城市平均PM10浓度达到98微克/立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达到每1000美元(2011年PPP计算)消耗178千克标准油当量,远高于世界134千克/千美元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单位GDP碳排放为0.613千克/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11、人口红利面临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

2014年中国失业率为4.1%,基本处在较低且稳定的水平。2014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73.6%,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正面临下降压力。从绝对数量来看,2014年适龄劳动人口较2013年增长0.04%,增速也在放缓,未来可能进入负增长区间。

12、人口数量下降,质量提高,基础医疗与发达国家差距仍较大

201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已基本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死亡率处于世界低水平。2013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5.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9.1岁。2014年中国每万人拥有执业医师21.2人,拥有病床48.5张,基础医疗较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

13、高等教育水平进步明显,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为18%,1982年仅为1%,但较G20国家平均28%、OECD国家平均33%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7%,低于32.1%的世界平均水平,较欧美国家50%以上的毛入学率差距更大。2013年中国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年,低于发达国家2到4年左右。

14、财政收入与税负负担处于合理水平,但人均税收收入较低

2014年中国科研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01%,人均科研经费支出仅为141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2014年中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但每万人全时当量仅为25.9人,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2014年源于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总量达17.6万件,列世界第三,但人均仅为1.29件,是日本的1/20。2014年高新技术出口额为5601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但人均仅为413美元,仅为韩国的六分之一,差距明显。

15、从供给需求两端实现“新增长”和“新发展”

总体来说,应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指导下,从供给、需求两端强化“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及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生态民生持续改善的“新增长”、“新发展”。

一是认清差距,找准定位,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认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中国从各方面看仍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上,且正在面临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过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中国在除经济规模外的大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有一些甚至还达不到世界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正是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提升国际竞争力,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强国富民美好愿望”的巨大需求,要满足这些需求,就需要通过加大有效供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是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构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型驱动力。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总体思路为: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简称为“强国富民”)为根本发展目标。以“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的“新三驾马车”为主驱动动力。以中长期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途径,变“着眼于短期需求调控的凯恩斯式的宏观政策”为“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依靠‘新三驾马车’推动的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宏观政策”。

三是加快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现有的投资与消费结构。投资来看,一方面要限制产能过剩和粗放式、低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也要积极鼓励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的“聪明投资”,大力促进民间投资,适度增加有效供给。

消费来看,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要反对过度消费、透支消费、奢靡消费,鼓励合理消费、理性消费。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

通过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带动服务消费比重明显提升;通过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通过人口城镇化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鼓励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

四是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双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近年来中国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但不少都源于技术引进、专利收购,归根结底与中国创新机制的缺乏,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漠视存在巨大关联。因此,必须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积极推进“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处置权限,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五是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区域战略基础上,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破解二元结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通过城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可续发展。

六是注重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要形成排放低碳、能量循环、资源再生,产出高效的生态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绿色银行、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等组成的“绿色金融”体系,用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的绿色项目投资。

七是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市场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以“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全面开放新体制。近期着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致力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吸引外资由以往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和任务加快从产品输出、货物贸易为主向产业和资本输出转变。通过多双边和区域自贸区扩大开放。积极应对TPP和TTIP,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

八是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仍然巨大,推动公私合营制破解基础设施建设障碍。下一步可重点推进生态环保、农业水利、市政设施、交通、能源设施、信息和民用空间设施、社会事业等七个重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破解基础设施建设难题,拓宽政府融资渠道,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九是积极改善医疗、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生产者效率的提高,这又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因此要使中国未来获得根本性的经济增长动力,克服人口红利下降的困难,积极改善医疗、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必由之路。